

DOI:10.15918/j.jbitss1009-3370.2017.0939

文化情境变迁中政治认同的生成考察

曾楠

(南方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州 510515)

摘要:文化情境是政治认同孕育的源泉与土壤,它直接关系政治认同的道义合法性与情感支持。文化情境的变迁与政治认同的生成样态紧密相连。纵观文化情境的动态变迁,东方君主专制时期、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与中世纪时期,在主体的附魅、利益的“充公化”事实生态中呈现专制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附和。当历史步入近现代,身份的多重、利益的多元、消费的至上,在东西方隐约呈现消费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分殊。伴随着公共领域的拓展与治理民主的尝试,民主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共识成为变迁走向。与此相应,政治认同呈现个体遮蔽与外在强力下的混沌化认同、“唯私症”与“冷漠症”双重裹挟下的私密化认同、自在自为的理性化认同的生成逻辑。

关键词: 政治认同; 文化预制; 价值附和; 价值多元; 价值共识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3370(2017)05-0156-06

“据我们看,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1]可见,文化是民族生活的另一呈现。戴维·波普诺曾指出文化包括符号、价值观、规范等元素,而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深层地反观文化的样态与叙事方式。

意义是对生活样法的感悟,认同是意义获得的重要源头,文化相较之其他要素具有意义来源的先天优先性与隐密渗透性。文化情境是政治认同孕育的源泉与土壤,其直接关系政治认同的道义合法性与情感支持。政治认同之道义合法性有赖于价值内核以支撑,文化共同体之形塑则有赖于政治制度以夯实。由此,审视文化之内核价值的变迁特质,得出其呈现专制型文化预制下价值附和、消费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分殊、民主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共识的变迁走向,在此文化预制下考察孕育的政治认同的生成逻辑则是政治认同生成考察的必要面相。

一、专制型文化预制下价值附和:政治认同的混沌化

专制型文化即“将君—民以‘主’—‘从’的秩序以限定,将君为民、民事君的等级政治文化以神圣不可触动的形式以规范,并以此文化为导引规约与影响人们的具体行为。”^[2]专制型文化在“君权神授”“奉天承运”等绝对型权威的论证中将个体对权力的遵从达致绝对化、合理化与神圣化,个体在此过程中呈现蒙昧、依附性,其在东西方历史上均有事实预设的隐约呈现,亦有理论立基的学理证明。

从事实预设的隐约呈现上考察,东方君主专制时期、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与中世纪时期主体的附魅、利益的“充公化”即是专制型文化预制下价值附和之事实的隐约呈现。东方君主专制时期君主以“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的标榜获得了天然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而以血缘为时间横轴、以地缘为空间纵轴向“土里讨生活”的农民则在“家国同构”的整体社会格局依据“差序格局”展开生活,在“三纲五常”的伦理束缚、宗法制度的道德规约下盲从地导向克里斯玛型权威,呈现主体的附魅样态。与主体的附魅相伴之则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利益“充公化”,个体的“私益”在绝对化的王权理念中置换为绝对化权力的附属品,“私益”的追逐亦成为与绝对权威、绝对价值、绝对理念相悖反的“逆生品”。西方古希腊时期公民生活即城邦生活,公民的私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均烙上城邦政制的印迹,而非公民生活则被判定为“非神即兽”的生活方式,城邦被赋予了至上的道德属性与政治权威,“古典公民相应地具有政治参与热忱(与闲暇)、

收稿日期: 2016-08-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民生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研究”(14CKS011);2016年度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课题“意识形态自信视域中的当代中国政治认同研究”(2016MZXX08);广东省教育厅特色创新类项目(教育科研类)“基于政治认同视角的政治理论课实效性提升研究”(2016GXJK022);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育资助项目(YQ2015034)

作者简介: 曾楠(1986—),女,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在站博士后,E-mail:znsy@126.com

兼具治人与治于人之素质、以城邦共同生活为最高价值标准、存在某种程度之特权与排斥(如对妇女、奴隶、外邦人)、注重卫国捐躯之军事美德等基本特征。”^[9]古罗马透过《罗马法》的颁布进一步确证“公民”资格,然而“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并未改变个体对罗马帝国的存在型依附。中世纪时期则以“上帝之城”与“尘世之城”的分野将个体从灵魂与肉体上均依附于教权与王权,在“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的“合理”界分下个体的灵与肉受到双重宰制。西方古希腊、古罗马与中世纪时期,与主体附魅的样态相伴之的同样是利益的“充公化”。城邦的至上性、帝国的僭越、教权与王权的宰制,使“私产”“私域”“私意”在这一时期均是备受批判与诟病的“违禁品”。价值是主客体关系的意向范畴,当主体呈现附魅性、利益表征“充公化”,其在价值层面则必然呈现缺失真实主客体意向的附和样态。

从理论立基的学理澄明上考察,专制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附和,其价值立基即一元价值的绝对化。绝对价值是人类逃脱尼采所言的“最高价值自身的贬值与罢黜”的虚无主义的努力探寻,是在多元语境中寻求人的存在根基的孜孜以求,然而当绝对价值推向极致化,则可能成为极权主义滋生的理论托辞。纵览人类思想史,思想家试图从理性、神性、情感的路径打通走向绝对价值的通途。诉诸理性的路径当属古希腊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的呐喊,“知识即美德”隐喻的是以理性的功用通向绝对价值、以明察事实确证价值的意义探寻。与苏格拉底“知识即美德”遥相呼应的则是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发声及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逻辑法则,至此苏格拉底、培根、笛卡尔均以其对知识、理性的确证将理性的路径确立绝对观念推向极致。当历史停留在中世纪,“上帝之城”对“尘世之城”的贬抑使神学的路径获得了优先性与合理性。中世纪上帝具有绝对权威、上帝意旨是最高价值准则,诉诸上帝的绝对价值则是以神学方式寻求一元价值的最佳脚注。然而,当尼采宣告“上帝死了”,神学方式即告终结。当理性与神学的路径均在历史的演进中以否定姿态终结时,诉诸情感的路径孕育而生,艾耶尔代表的情感主义指出绝对价值观念实际上只是些仅仅表达情感而没有任何知识论意义的伪命题。新康德主义者洛采、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则认为可以透过先验性与超验性的情感获至绝对价值观念。综观理性、神学、情感的价值通途最终均被韦伯所言的“祛魅”的现代化进程所冲破,即使海德格尔从存在论视域以“在的澄明”的努力也未能阻断绝对价值消解的历史宿命。叔本华的“痛苦”、萨特的“焦虑”、海德格尔的“烦”、克尔凯郭尔的“恐惧”等哲学命题的呈现,某种意义正是现代进程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后绝对价值缺失的情绪动态。需要指出,专制型文化预制下价值附和表征所立基的一元价值绝对化与绝对价值的追寻并非同一过程也非同一义理,它是将绝对价值推向极致,而否定价值相对性的病态价值观念,在现实政治形态上则极易导向极权主义。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与其说是对“最高价值的罢黜”,不如说是以最振聋发聩的吼声冲破极权主义依附的绝对价值极致化的藩篱。福柯的“人之死”、后现代的“什么都死了”则是在历经绝对价值的虚无后无奈的呻吟与反思,这也预示着现当代在高喊“什么都可以”后对价值共识的渴望与可能。

专制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附和,在政治认同层面表征为混沌化。一是认同的蛰伏;认同是一种对自我或群体的自觉认知,在认同的自觉认知下界分“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10]专制型文化预制下的个体实质属于马克思所言的人的依赖存在状态下的“依附型个体”,其个体特性如同海德格尔笔下的“存在的遮蔽”样态,由此孕育的认同则属于未能对自我真实认知的认同,认知的个体之“我”更多的属于他者界域规约与设定下的总体性的“我”。认同不仅蕴含认清“我是谁”,它更内蕴着“我们是谁”的回答,进而把“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然而,专制型文化预制下政治认同依托的并非涂尔干言说的“有机化的社会”,而更多的趋近于滕尼斯所言的“想象的共同体”,专制型文化下依托的“想象的共同体”实则表征为“族阈共同体”“城邦共同体”“宗法共同体”或“道德共同体”,共通的特性即是将个体规约于血缘或地缘为联结的狭隘视域中,个体的特性均打上人的依赖性的烙印,而“他者”也在“想象共同体”的束缚中未能真实的展开,由此表征的政治认同既无法清晰地回答“我是谁”、也无法真实地认知“我们是谁”,进而也难以将“我们”与“他们”区分,实则是在个体特性的遮蔽与他者世界的规约下的混沌化的认同。二是认同的强力。专制型文化从文化特质上解读,最集中的特性即“强力”,它以权力绝对化的神秘逻辑法则将个体牢牢束缚于共同体中,其导引的政治认同表征的强力既呈现于观念层面,也呈现于过程层面。考察专制型文化导引的认同的强力于观念层面,可以得出,专制型文化下的政治认同并非生发于个体自我意识的萌发与彰显中,而是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或“君权神授”“受命于天”的旨意下强制性导引的认同,对“政治”的否决会被视为“逆天之行”而被强力或所谓的“法制”所暴虐。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中世纪教会间的屠杀均是其最佳脚注。专制型文化导引的认

同于过程层面同样呈现强力的特性,专制型文化土壤生成的政治认同并非由个体与共同体的协商或沟通所达致的“协商性认同”,而仅仅是自上而下由权力所“绑架”的“给予性认同”,个体达致的政治认同并未通过公共参与或公众舆论的激活所达致,而仅仅是以强力施予的被动服从式的强制性认同,由此观念层面的强力与过程层面的强力使政治认同走向非自主的混沌的认同。

二、消费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分殊:政治认同的私密化

消费型文化即在“欲望着他者的欲望”“消费着他者的消费”的拜物教狂欢中以消费为生活动力、以消费为价值主题、以消费为情感寄托、在机器混杂、商品炫耀的琳琅满目中寻求消费刺激以引领其生活风向与政治价值的特质文化。在经历亚当·斯密《国富论》到马克思《资本论》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列斐弗尔的日常批判理论、德波的景观社会理论和鲍德里亚的符号拜物教理论,消费型文化的理论彻底奠定。在消费型文化下以符号象征激发的感官刺激与需求满足使个体在“异化”的“物的依赖性存在”样态下以犬儒化的冷漠姿态替代传统对绝对权力的遵从,其在近现代的东西方也均有事实预设的隐约呈现,亦有理论立基的学理澄明。

从事实预设的隐约呈现上考察,近现代东西方身份与利益的多元即是消费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分殊之事实的隐约呈现。近现代东西方伴随着韦伯所言的“祛魅化”进程与“理性主体的发现”,在工具性价值的事实性统摄下,普遍共识的价值标准、统一的终极目的、等级化的价值序列逐渐被现代身份的多样与归属的多重所替代,个体以“原子化”的姿态漂浮于“碎片化”(鲍曼语)的现代化进程中。传统社会个体身份以“集体中的个人”形态捆绑于血缘与地缘的纵横轴坐标中,个体的身份均烙印政治的属性。然而,随着全球化进程、市场化浪潮、媒介化袭卷,在传统联结的崩塌、时空分离的压缩、自主个性的涌动下个体从一元的传统“臣民”走向了政治与文化多重属性复合的公民,正如哈贝马斯所言,它“具有双重特征,一种是由公民权利确立的身份,另一种是文化民族的归属感。”^[6]然而,在民族国家受到超民族国家与亚民族国家双向力量的挑战与冲击下,在琳琅满目的市场商品背后所指向的抽象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序列对真实权利义务的碰撞下,由民族国家架构为前提,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公民身份被多重、多层次、多样态的身份言说所冲击,次民族国家、民族国家、超民族国家境遇中形塑的身份的多元导向价值层面的分殊与“争吵”。与身份多元相伴之的消费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分殊的事实呈现即为利益的多元。“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6]伴随近现代社会经济一体与多元分化的进程,“《物权法》以法的形式对物权的确证,并未把以物为联结的个体有机联结,相反,它以更为明晰的界限将社会关系中的个体隔离开来。”^[7]在以“物”为追逐标识的“祛魅化”进程中,“物”的幻象背后潜藏的实体界分催生价值序列的次生因子,由利益的多元导引价值的分殊与无序化。

从理论立基的学理澄明上考察,消费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分殊,其价值立基即价值的多元主义。考察人类思想史,维特根斯坦、蒯因、库恩、杜威、罗蒂、伯林等多元主义者认为,在人类多元价值序列中不同的文化、价值、理念具有不可通约性,“正当”与“善”不可通约,不同文化语境的价值命题试图寻求普遍适用的合理性话语根基往往以失败告终。具体而言,维特根斯坦从语言的游戏规则解读,提出语言之间的游戏规则均蕴含其不可替代与不可通约的价值密码,共通的神秘因子无从找寻;蒯因同样从语言的共通着眼,提出文化背景与生活经验的差别化,指出不同语言之间无法以共通的语义为基础达致共通;库恩则从“范式”着眼,指出范式之核心即信仰、价值观念在不同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规范上无法通约,在义理上仍是坚持价值的多元主义;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从多元的生活经验情境出发,提出经验是多元的,且不同情境、内容、关系中生发的经验不可互相解释与通约;罗蒂作为后现代哲学家,美国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在“语言学转向”的探讨中推崇不可通约理论,即文化之间、历史时期之间、学科之间的术语与澄明都是不可通约的。在其作品《哲学与自然之镜》中亦有相关阐释。伯林则在“两种自由论”的叙事表达中更为直接的指出:“人类的目标是多样的,它们并不都是可以公度的,而且它们相互之间往往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8]诚然,价值多元主义者在一元与多元的内在紧张、普遍与特殊的内在悖论、相对与虚无的内在消蚀中不可避免的滑向相对主义的危险或导向虚无主义的潜在风险,其内在逻辑批判与悖反的宿命实则向寻求“共同善”发出了邀请与诉求。如洛克与约翰·穆勒在此岸亮出不可通约的盾牌,却在彼岸寻求通约共识的可能,试图以宽容、通达、理解寻求共通之处。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提到“真理只有一个,到天国之路只有一条”^[9],但面对不同宗教信仰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他又抛出以“宽容”求和解的橄榄枝;罗尔斯则将“正当”与“善”分离,在所谓的价值中立上追求

隐喻价值偏好的“制度正义”;约翰·格雷则在一端对价值分歧坚持执守,提出“那些极其重要的自由不会结合成一个单一的、和谐的模式。它们是价值观念冲突的场所。”^[10]然而,在另一端又抛出极度“干瘪”的所谓“普遍善恶”之底线,由此可看出,彻底的多元论难以克服自身的理论困境,在人类共通文明的底版上寻求价值共识仍是当前走出多元主义困境的可能出路。

消费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分殊,在政治认同层面表征为私密化。一是认同的消解;“全球化的主要后果之一是‘叙事’的相对化。”^[11]伴随着以商品消费为先导的全球化进程在价值层面走向了‘叙事’的相对化,恰好应验了海德格尔所言的“在‘诸神的消失’和‘世界的没落’的这一刻,无家可归成为了时代难以逃离的宿命。”在无根的价值相对沉浮中,“思想”与“主义”经历着不断的试验、规划甚或冒险的过程,而个体则在“什么都可以”的境遇中遭遇着无所适从的“临时漂泊”。“现代性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之所以这一行进仍须继续下去,是因为它到达的任何一处地方都不过是一临时站点。”^[12]“流动的现代”“价值的相对”“无根的浮动”“消费的盛行”使个体纷纷蜷缩于自我的领地,沉迷于个体的“小我”,而对政治呈现唯私症与冷漠症。公民不再是独立的政治个体,而是在消费文化包围中的一个闲散的消费者,他们在进行偏好选择时不再以价值秩序为导引,而是以既定的物质需求菜单为浏览向导。在物质需要为主菜单的世界中,“政治市场”这一怪异的“商品”,则可能会被“消费者”直接屏蔽。政治认同亦在“唯私症”与“冷漠症”的双重裹挟下走向私密的个人利益与个体私域,进而呈现私密化取向。二是认同的挤压。近现代在开启“启蒙神话”时,“启蒙的魔咒”也正悄然而至,“一切都运转起来,一切都被连根拔起,一切都被纳入了‘行星范围的技术座架之中’”^[13]当消费、符码、虚拟、需要、区分等元素在“高度压缩”的时空成为现代社会的特定标识时,现代的个体在狂欢中迎来“众神的光环”,也陷入唯我的以欲望为冲力的符号逻辑中,“欲望成了它自己的目标,而且是唯一的无可非议、不容置疑的目标。”^[14]欲望的充斥在鲍德里亚所述的“消费社会”中则被琳琅满目的物质需求以满足,“我消费故我在”的理念刷新着个体的“存在感”。近现代“消费”的标识已不同于传统的消费,商品的使用价值也已“异化”为身份、地位、阶层等象征符号。“起源”“中心”“在场性”“等级”“主体”“身份”和“同一性”“民族国家”“文化本质主义”“族裔自我中心”“普遍性”“规律”“法则”“结构”和“边界”等一系列传统的文化记忆均被消费型文化所冲击,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多元幻化则悄然登场。当政治认同遭遇欲望的疯狂填充、符码的精神充斥、消费的唯私放纵,躲避崇高、“娱乐至死”的私密化取向则如影随形。

三、民主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共识:政治认同的理性化

民主型文化即主体间在相互承认基础上以话语沟通为介质,以权力制约序列与权利转化系列、政治输入与政治输出双向机制、现代国家建构与社会自主发展互动为制度平台,在协商、交往、沟通基础上推进共识达致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价值。民主型文化以对话、理解、参与为价值特质使个体以自由的类形态达至对权力权威的遵从信任,其在现当代既有事实可能的隐约呈现,亦有理论立基的学理探求。

从事实可能的隐约呈现上考察,现当代公共领域的拓展与治理民主的尝试即是民主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共识之事实可能的隐约呈现。依据哈贝马斯对社会领域作出的公共权力领域、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划分,得出公共领域是规避公共权力领域吞噬私人领域、私人领域消泯公共权力领域的有效场域,“所谓‘公共领域’,意指像公共意见这样的事物能够形成的一个领域。”^[15]^[15]随着国家与社会由高度重合走向有限分离,公共领域作为政治认同的实践空间在这一时期由哈贝马斯所言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走向了“公众型公共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形成了公众。……在这个领域中,作为公共意见的载体的公众形成了,公众在公共性指向的领域范围中真实的参与、走进真实的民主。”^[15]^[16]公共领域的拓展,完善着“人的条件”(阿伦特),使“生活世界与系统”形成了“有机联结”(哈贝马斯),进而拉近“公民与国家的距离”(查尔斯·泰勒),“使民主运转起来”(帕特南)。与此同时,治理民主的尝试亦是民主型文化预制下价值共识之事实可能的隐约呈现。“民主是个好东西”,然而审视人类对民主追求的历史,自由主义民主以“现代人的积极自由”为基础,试图回答如何限制公共权力,保证个人的自然权利;共和主义民主则以“古代理人的消极自由”为基础,试图回答如何确保公民的普遍参与,保证权力的合法性支持。然而不论是自由主义民主抑或共和主义民主,其均未能规避政治实践中规范意义过强或过弱的弊端,而可能演化为代议缺席式的“弱势民主”或“多数人暴政”式的“强势民主”。为跳出共和主义民主与自由主义民主的泥淖,治理民主作为一种新型民主于20世纪末提出,它超越传统“统治”概念,超越将民主限定于政治与行政论域的民主理

念,既从合法性向公共性转变并以去中心的社会建构促成公共性的再生产,也在公共性原则下推进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推进效率与公共性的平衡。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它有效规避了“强势民主”或“弱势民主”内在弊端,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效率与公共性平衡中汲取民意,共通协商,是民主型文化的事实注脚。

从理论立基的学理上探明,价值共识是社会成员基于价值多元序列形成的共通型认知,其指向的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共同体与个体成员的共融与一致。明辨“使人类基于普遍思想自由达到的同一性认识更为深刻、丰满,因为其不再是向传统或向古人的一次简单重复,而是面向完全不同、透明裸露的外在现实的深刻洞见。”^[16]民主型文化为价值共识达成所需的比较、明辨、批判等要素型构着价值密码与指向预判。需要指出,民主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共识并非“铁板一块”的强制性共识,也非无差异的凝结化的僵化型共识,而是在历史叙述与流动的时空中,基于差异、差别基础上平等的、多元的主体之间积极澄明获得的动态的“同意”。考察人类思想史,探寻价值共识的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一直未停息,爱德华·泰勒就提出人类历史上一定程度上是一部文化间交流、模仿、传播的历史,文化间共融的事实存在、多元文化的“共通性”与整体性质的相似性决定了价值共识的可能;乔姆斯基则从语言“深层的普遍特性”出发提出语言的不可公度性仅仅是外在的言表,而“普遍的特性”则是语言文化的深层本质;此外,马德克“世界文化的公分母”、海登·怀特历史叙述共有的“深层结构”、马克思“趋同的社会生产实践”均试图回答着价值共识的是否可能。检阅人类思想资源库,在试图回答价值共识是否可能时,价值共识如何可能的找寻也未停步。除去强制的灌输、神秘因子的附魅、愚民说教的政策强压,康德、黑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罗尔斯等分别以“普遍法则立法法、价值判断可普遍化法、视域融合法、交往对话法、重叠共识法”^[17]为当前价值共识达成提供了可能通途。综观价值共识的可能通途,其实质试图以价值的契约、视域的融合、语言的共通、合理的交往、存在的澄明等方式“敞亮”遮蔽的文化叙事,以回到生活世界以反求诸己的省思达成人类的共通契约,结束“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原初状态,而走向由“公意”所达成的“重叠共识”。现代化进程中当代中国同样不可避免的面临多元化的时代情境,在多元化时代情境中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在视域融合的理解“间距”弥合下促成共识不失为一剂良药。

民主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共识,在政治认同层面表征为理性化。一是认同的自在自觉;认同虽然“可以是强加的,但很少如此;更正确地说,认同是皈依的,因为它们呈现的正是人们想要的。”^[18]民主型的文化预制使个体在明辨、博弈、批判下以“差异”为前提,以“共同善”为目标获致价值共识,如“运动的各个方面、各个水滴(=‘事物’)、各个‘细流’等等的总计”^[19],在此过程获得的“总计”使认同不再是被神秘因子主宰或权力权威强制,而是在审美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获得平衡的自主的认同,呈现的正如人们想要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的体系”的法理型认同。“沉醉于技术的迷梦和着魔于解放的理想社会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偏见。”^[20]然而,民主型文化并非“乌托邦”式毫无瑕疵,在开启启蒙的神话时,也给启蒙的魔咒以足够的警笛;在沉醉技术的迷梦时,也强力摆脱着“单向度的人”的桎梏;在控诉单向的强制时,也挣脱着多元幻化的牢笼,在民主、平等、自主的沟通中克服当今时代的偏见,进而在充分尊重现代社会“合理的多元论事实”的基础上呈现自主的经批判反思的理性认同。二是认同的自在自生。认同是“行动者自身的意义来源,也是自身通过个体(Individuation)过程建构起来的”^[21];意义主要指其行为目的或行动动机被主体被认定的“象征性认可(Identification)”(曼纽尔·卡斯特的语)。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开启,社会正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认同的意义来源也由克里斯玛型(韦伯语)向法理型迈进。公民文化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悄然孕育,公民文化是“公民对政治运行介于参与‘狂热’与冷漠疏离之间的平衡型文化,是公民对权威信任遵从又敢于理性监督的融合型文化,进而能够有效把控政治冲突于政治系统有序运行范围内。”^[22]主动和参与之间形成融合的公民文化,在明辨与批判中获得的价值共识,使个体的认同由被动走向自主,由自发走向自觉,民主型文化预制下的价值共识的达成,政治的认同开启的则是“从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谨慎之间、从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找平衡,在犬儒与狂热之间寻求认同之路。”^[23]

参考文献:

- [1] 梁漱冥.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8.
- [2] 俞可平. 增量民主与善治[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18.
- [3]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寿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109-129.
- [4] 亨廷顿. 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M]. 程克雄,译.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20.
- [5] 哈贝马斯. 包容他者[M]. 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3.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09.
- [7] 涂尔干. 社会分工论[M]. 渠东,译. 北京:三联书店,2000:81.
- [8] 伯林. 自由论[M]. 胡传胜,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3:244-245.
- [9] 洛克. 论宗教宽容[M]. 吴云贵,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7.
- [10] 格雷. 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M]. 顾爱彬,李瑞华,译. 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78.
- [11] 罗伯森. 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M]. 梁光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2.
- [12] 鲍曼. 现代性与矛盾性[M]. 邵迎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
- [13] 张旭东. 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1.
- [14] 鲍曼. 流动的现代人[M]. 欧阳景根,译. 上海:三联书店,2002:111.
- [15]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M]//汪晖,陈燕谷. 文化与公共性. 北京:三联书店,1998:125.
- [16] 泰勒. 黑格尔[M]. 张国清,朱进东,译. 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614-615.
- [17] 韩东屏. 如何达成价值共识[J]. 河北学刊,2010(1):37-43.
- [18] 拉彼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 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M]. 金焯,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43.
- [19] 列宁. 列宁哲学笔记[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4.
- [20] 伽达默尔. 赞美理论[M]. 夏镇平,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95.
- [21]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M]. 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68.
- [22] 阿尔蒙德,维巴.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 徐湘林,译. 上海:东方出版社,2008:5.
- [23] 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M]. 吴睿人,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9.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in the Change of Cultural Context

ZENG Nan

(Academy of Marxism,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515, China)

Abstract: Cultural context is the source and soil of political identity, i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moral legitimacy and emotional support of the political identity. The change of cultural contex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formation of political identity. Throughout the dynamic changes of cultural context, eastern monarchy period, the Western ancient Greece, Rome and the Middle Ages, in the subject attached to the charm, the interests of the “confiscation” ecological fact showing the despotism of cultural prefabricated value. When the history into modern times, multiple identity, interests of diversity, supremacy of consumption,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vaguely show consumer culture prefabricated under the value of different. Along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the attempt to govern democracy, the value consensus of democratic cultural prefabrication becomes the trend of change. Correspondingly, political identity after generation logic of under individual and external strength presents chaotic identity, under the double coerces of “privacy” and “indifference” presents private identity, self-centered R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political identity; cultural prefabrication; value echo; value diversity; value consensus

[责任编辑:箫姚]